

马克思生态系统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的重构

杨 阳

(重庆邮电大学 移通学院, 重庆 401520)

摘要:世界亟须找到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应对由生态危机及灾变引发的系统性挑战。用把握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物质变换关系的马克思生态系统理论剖析资本主宰下的普遍异化对自然界的戕害,可发现具有反生态天然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刻原因。只有充分认识马克思生态系统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意义,才能克服受到市场、资本与利润的视域束缚的思维局限,对系统重构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再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系统观;现代经济理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N9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2-0010-05

系统辩证学认为:“任何生物系统都不能脱离环境系统而单独生存。”^{[1]201}人类社会不可能脱离生态环境孤立地发展。在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巨系统中,构成因素的比例关系达到某一定值时,该系统诸因素间会表现出协调、和谐、一致的平衡状态,当这种状态被打破时,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会在交互影响中呈现。近100年来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使人类社会动荡频发,寻找破解之道已成迫切课题。在积极寻求技术层面的破解之道的同时,整个社会成员自身的行为方式、生产模式及生活价值理念仍存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相悖之处,需要从整体上系统性地审视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马克思生态系统观提供了新的视野,为我们反思100多年来的传统经济学开启了新的理论之光,为重构生态文明社会的现代经济理论指出了方向。

一、重塑生态文明须改变受市场、资本与利润视域束缚的思维

近年来,愈加严峻的生态危机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重视。由生态危机而引发的系列灾难,诸如气候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异常时间持续延长、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动植物物种灭绝数量急速增加等现实而紧迫的灾变已经使得生态灾难不是任何单一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偶发的、临时的困境,而是一个阻碍全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大挑

战。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人类一方面在积极寻求技术层面的破解之道,同时也开始反思和审视自身的行为方式、生产模式及生活价值理念中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相悖之处。作为一种反思和审视的结果,国际社会正把在发展中重塑生态的愿景作为未来国家和社会整体层面的行动目标及前进方向。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历了高速增长,但为之付出的生态代价也异常高昂。因此,中国与世界一样,亟须找到新的方法和手段来应对由全面生态危机引发的系统性挑战。

经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低碳经济正成为当今经济学说中的高频词汇;绿色、环保的观念正在不断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我们行动方式所遵循的一种原则和标准。这也意味着人类在反省和醒悟后,正试图逆转人与自然界早已严重倾斜的天平。但是,我们对危机的反思不够充分,仍局限于制造生态危机的技术层面和道德伦理层面。这样的反思难以从整体上和系统上发现其产生危机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深层根源,而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根源才是认识这场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及灾变的关键。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多关注剩余价值生成背后的剥削,而对其在生态环境方面影响的危险性没有给予充分重视,甚至有学者

收稿日期:2019-09-06

基金项目:2017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马克思生态理性系统辩证观的当代价值研究”(17SKG253)

作者简介:杨阳,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与跨文化研究。

提出运用市场法则来构建“自然资本主义”或“气候资本主义”的观点,这实质上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从环境的敌人变成了环境的救世主”^{[2]97-104}。我们期望重塑生态文明,恢复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和协调,首先要超越市场、资本与利润的视域和思维局限,转而从马克思生态系统理论所把握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中寻找答案。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生态系统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进行批判和透析,才能全面深刻理解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背后的动因。

二、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的天然本质是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刻原因

传统及延续至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相互竞争用途的科学”^{[3]97-104},其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它注重研究人与物的关系而不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它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理论学说。这一学说在今天形成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学界起支配作用的庞大而严谨的学科体系,其目标和历史使命在于更好地指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经济发展,为该制度下的经济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即当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质疑和批判时为其合理性提供辩护。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将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任务核心,背后传递出的信息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从其产生伊始,就是片面追求财富极值效应的经济发展制度。这种迷恋个性贪婪的经济制度专注于“最优化”攫取和配置资源,很难关注资源数量的充足性,更难以从长远的时空跨度考虑子孙后代在资源获取和配置中的代际公平问题。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任何层面的生态价值观都会被弱化和驱逐,市场各主体一旦被财富和利益蒙住双眼、迷住心智,就会狭隘到冷酷无情的程度。“经济增长以及与之有关的环境破坏,乃是市场关系的经济所产生的功能的直接污染,这种经济是建立在两条首要的原则基础上的:私人所有制和追求利润的动机。”^{[4]81}生态危机产生的本质实际上是这种市场行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长期性累积的恶果逐次叠加到大爆发。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是资产阶级垄断占有生产资料并追求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条件,也是资本主义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无止境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动力源于追求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和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必然要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资本的无

限扩张性同可利用的稀缺资源的有限性构成难以调和的矛盾。资本在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又在相反的方向尽力压缩成本支出以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在可控成本的领域,除了人工、材料、交通运输、存储等显性部分,资本还往往向自然进行利润索取,通过对自然资源过度消耗,求得短期内暂时性的利润增长,但在利润索取过程中对于自然损失产生的隐性成本却漠不关心。正因为资本几乎不会主动去关注“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平衡……它所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产生出最大的交换价值”^{[5]5},这种极度的逐利本能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危机。

忽视人类与自然界的价值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另一大成因。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规模的扩大往往受到诸多外部条件的限制,如消费市场的购买力增长乏力、受自然资源存储数量条件的限制等。为了使消费市场保持一定数量的增长以扩大利润,资本主义的生产往往更依赖于消费者的浪费式消费来实现。这意味着,消费者很可能不是根据对商品使用价值而产生的真实需求,而是受到商品的广告营销宣传产生的一种为满足新奇体验或显示身份地位区别的虚假需求。商品生产者和商品购买者之间正常的、便利的、互惠互益的关系被利润所左右的非理性的生产和消费关系所取代,这一现象隐含地说明,在资本威力的侵蚀下,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已经被异化,“商品的使用价值,隐退到了不重要的位置,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销售商品获取利润”^{[1]97-104}。资本通过花样繁多的商业广告营销催生和刺激了浪费式消费的膨胀,同时与之对应的则是浪费式生产的数量激增。两者的互动除了造就出一种表面上市场兴旺和会计利润指标稳步跃升的“喜庆”假象,对真正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正如美国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对挥霍性消费所论述的:“这是对人的生命或人类整体没有意义的花费。”^{[6]78-86}这种被异化的任何单个消费现象若放大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般性来看,实际上就是资本控制下的社会经济组织有计划地、却又不计后果地对自然资源的大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毁灭。

一旦资本家将利润作为其行动的起点和终点,那么不论人类面临怎样的资源短缺困境,对资本所有者们来说,即便是关注或讨论与自然生态有关的事项,也仅仅是从技术角度来研究和论证如何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资源,怎样依靠延长产品的使用周

期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性浪费来延缓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为他们相信,科技的发明和创造会使人类当今面临的许多环境问题迎刃而解。

通过科技进步化解资源危机的观点,在过去数十年里确实有大量的实证案例,以至于有相当多的环境经济学家认为“自然环境资本”“发展循环经济”等方法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这种理论实质上仍然是建立在“市场万能”或“资本万能”的基础上,其背后隐藏的深层含义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并非一种平等的实体领域,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单向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至于人对自然界的征服程度和控制范围则取决于技术的发达程度。这样的逻辑价值观必然使得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矛盾更加尖锐突出,因为资本化造成的全面生态危机是不能靠资本和市场手段来解决的。问题的症结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那样:“一种制度如果追求无休止的几何增长和无限度的财富攫取,那么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都是不可持续的。”^{[7]83}

三、用马克思生态系统理论剖析资本主宰下的普遍异化对自然的戕害

当人类社会为资本所主导时,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便被割裂,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物质变换关系蜕变为单向的物质能量输送关系,而且输送方还要被迫承接输入方的大量工业和生活废弃物,留下的是一种难以修复的新陈代谢断裂,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后的极端后果。资本所导致的异化,并不仅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社会矛盾日渐激化、族群或阶层间对立与分化严重等其实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外在体现。这些源自人类内部的种种异化汇集起来又从总体上进一步推动、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和分裂。

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实践(劳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性,认为主体与客体统一要以实践为中介^{[8]45}。“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通过劳动把它们连接为一个范畴链,这是系统辩证学对社会历史系统研究的结果。”^{[1]198}然而,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从劳动这一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正因为劳动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彼此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人的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作用,同时人类活动也对自然界产生能动性,二者统一于一个整体中。但

是,异化劳动使二者间的互动中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出于对资本增值的追求,资本所有者必然对劳动者进行更多剩余价值的压榨,劳动者在资本面前,已不再是有着自主意识、有着自我决断能力的自然劳动者,相反,他们已经异化为一种有助于资本增值且存在着有机生命的特殊工具。对于工人来说,劳动仅仅是他们谋取生存资料的途径,是纯粹获得一定数量物质报酬以维持肉体生存的必要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其生产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则完全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这种异化劳动,使人把自己从自然界这一原本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中完全异化出去了。除此之外,异化劳动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对立和因彼此间缺乏信任而产生的防范和猜疑。资本以货币作为劳动者付出劳动后的唯一价值偿付,劳动者从事劳动的贡献和意义由此被简单地货币量化,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本质亦开始物化。物质逐渐成为人的象征和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对物占有越多,往往以为卓越成功,由此激发现代人对自然界的疯狂占有和掠夺,并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技术的异化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科技对人类社会有着积极的贡献,但科技的进步也并非总是呈现正效应,科技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从相反的方向破坏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中性事物,科学技术一旦被资本集团所掌控和垄断,就会转而简化为实现资本利润的利器。资本通过对技术的掌控,可以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地控制自然,进而为资本积累增添更多的资源供给。资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最终将完成对人类本身的控制。“从表面上看,当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根源于人对自然的控制方式,但实质上却根源于人对人的控制方式。”^{[9]812-815}人一旦失去了对资源的所有和使用权利,也就意味着自身的人格独立和自由将不复存在,迫于生存压力,人将被迫依附于能提供资源的任何组织或集团,并自始至终成为该依附对象的附庸。人与自然资源将组成资本运转的两个轮子,为资本利润完成永不停息的重复旋转,直至劳动力本身的完全丧失和资源的彻底枯竭,这就构成了资本社会控制的深层基础。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理性工具化日趋强烈的发展趋势,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即技术一边在解决自然生态危机问题,同时却又制造出更多、更棘手的新问题。随着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和规模更加扩大,这个矛盾将人类推向自然极限的速度就

越快。隐含的危机就如福斯特所指出的：“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冲突。”^{[7]2}

消费异化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透支。正如前文所述，资本为了尽可能多地扩大积累规模、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必须不断增加市场需求，这就对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构成巨大压力。但对资本家来说，其首要任务是如何创造足够多的消费需求以满足因不断扩张而形成的巨大剩余生产能力。这就需要极大地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打破他们固有的对商品价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产生购买冲动和激情。广告宣传营销就成为实现上述目的的强有力的武器。1958年，约翰·肯尼思·加布尔雷思在他所著的《丰裕社会》一书中为推翻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主权理论曾经这样写道：“生产创造出需求，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推定为满足人们的需求。”借用这句话，不难发现如今市场上的许多需求正是被商业营销所虚拟出来的，目的是刺激消费。对于一部分消费者来说，购买某种昂贵商品或许根本不是出于其使用价值，而是通过拥有这种别人得不到的商品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实力，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社会地位。对于买卖双方来说，买进和卖出的已经不是物化的商品，而是品牌、头衔、名望和身份。当商品含有这一层社会和心理意义的价值追求时，人的潜在的妒忌性攀比欲望便被激活，从而导致社会中无论是富人、中产者还是一般工薪阶层均开启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虚荣心，这必然促使受资本统治的人们更疯狂地开采资源进行生产来满足和支撑这样的消费，进而加剧同有限资源的矛盾，最终结果就是生态系统被破坏。

四、对系统性重构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学思考

从根本上看，生态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及无止境的利润追求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一场全面的、持续性矛盾对立的大危机。要重新塑造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若不从系统性视角全面反思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很难实现由生态与人类社会构成的宏观系统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

其一，对“经济人”与“生态人”的双重假设视角的选择。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在激励和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过于强调人的经济理性并将人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抽象为本着利益最大化的交易行为，排除了人存在于社会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也拒绝承认人的行为对外部环

境的能动性和外部环境条件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制约的客观现实。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18}，而社会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是受生产力决定并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这说明人的发展和人存在的意义绝不是仅仅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它还包括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人打算维持、享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等更丰富的内容。“经济人”理性之所以是对社会的一种不完全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知，就在于其忽略了这个群体在历史发展的动态中与外部自然界早已产生并且不断加深和密切化的千丝万缕的事物联系及能量、信息交换。作为工业文明下市场经济的产物，“经济人”的价值选择不是一个可以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而被随意剔除的随机变量。当人类迈入生态文明时代之际，其发展的关键就是要超越“经济人”假设的狭隘视角，向具有生态价值和代际公平、能以生态理性进行自我约束、追求人与环境共生和谐的“生态人”进行跃迁。鉴于此，要实现重塑生态文明这一宏大而艰巨的未来目标，需要在经济学领域建立新的理念范式并植入人的思想，最终影响人的行为范式和价值判断。作为一种新的人格模式，“生态人”不仅要寻找人与自然的解放，还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自我心理、精神和灵魂的解放，最终成为和谐理性的人。

其二，从先行构建人自身的和谐性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将人类的整个进步”的内容归结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1]449}，即人的和谐包括人与外部自然和谐以及人内部自身的和谐。过去我们批判人类行为危及生态环境的基本视角是把人作为一个行为主体，自然界则成为人行能动性的客体，人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自然界以灾难的方式进行报复。因此，保护环境所诉诸的手段通常是加强生态环保宣传，要求政府对破坏环境等违法行为进行强力打击，呼吁相关立法机构制定更多的法律法规来进行更加全面的管控约束等。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切不和谐矛盾都是基于人与外界这层表象，没有对我们自身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对这种源自人自身的矛盾与冲突是如何作用于外部自然环境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内省。

应该看到，人类发展与自然的矛盾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与自然生态不协调的矛盾，而是人类社会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的利益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人与人的利益冲突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症结所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最主要的利益冲突体现在少数人占有、控制社会大部分生产资料而变

得愈加富有和贪婪,大多数人却因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不仅丧失了作为人起码的尊严,而且失去了完整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和自由。资本家需要更加无情地压榨剩余价值,这只会导致社会财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社会阶层矛盾更加突出。一方巨富而一方赤贫的极端分野使得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致使资本巨大的剩余生产能力面临闲置的风险,资本家需要让消费者在虚荣心的助推下成为资本利润增长的主力军。对于广大普通劳动者来说,异化的劳动条件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饱受折磨,因此希望通过它为心理失落感和空虚感进行虚假补偿和填充。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撑起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在加重环境负担的同时,也让人在利益和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综上所述,生态危机是一种过度生产、过度消费活动的结果,但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生态危机其实是一种制度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是与生态文明背道而驰的社会制度”^{[9]72},它不仅有悖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这一基本原理,而且有悖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相匹配这一现实性。“要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就要考虑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之间的数量比例应当是一种协调、和谐适应的关系,以维持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动态平衡稳定,促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向组织优化、有序化的方向发展。”^{[1]201}当前要治理生态危机、期望重塑生态文明,最重要的是建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获得人性的解放、取得应有的人格尊严,人才会把自己看成有自决权的个体思考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为自身的行为肩负起责任。只有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向组织优化、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建设经济繁荣、社会公正和生态理性的社会才

切实可行。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预示未来前行趋势的文明革新和文化历练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乌杰. 系统辩证学[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 [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J]. 张峰, 译.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5): 97-104.
- [3] 莱昂内尔·罗宾斯. 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 朱泱,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4] 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 [5] Gorz A. Ecology as Politics [M]. Boston: Southend press, 1980.
- [6]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3.
- [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 宋兴无,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8] 邵光学, 刘娟. 列宁生态思想及其实践[J]. 系统科学学报, 2016(4): 48-52.
- [9] 管锦绣. 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视角[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6): 812-815.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2] 邵光学. 系统把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J]. 系统科学学报, 2019(4): 70-76.

[责任编辑 文 川]